

# 网络诈骗受害脆弱性的心理影响因素与机制研究综述

孙瑜滢, 沈欣

浙江工业大学教育学院, 浙江 杭州

收稿日期: 2026年4月23日; 录用日期: 2026年5月29日; 发布日期: 2026年6月9日

## 摘要

随着互联网技术快速普及, 电信网络诈骗已成为危害我国公共财产安全与心理健康的重要社会问题。由于诈骗实施者隐蔽性较强, 现有研究多聚焦于个体网络诈骗受害脆弱性。本文回顾该领域相关研究, 界定网络诈骗、受害脆弱性等核心概念, 阐述有限自制力理论、双系统加工理论、日常活动理论等理论基础, 从认知、情绪、人格特质、社会环境四个维度归纳网络诈骗易感性的心理影响因素, 并总结当前脆弱性测量方法与学界研究共识及争议。最后, 本研究也提出了以往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从多方面提出未来研究展望, 以期完善相关理论体系, 为我国反诈实践提供心理学参考。

## 关键词

网络诈骗, 受害脆弱性, 自我控制, 反诈防控

# A Review of Psychological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Mechanisms of Online Fraud Victim Vulnerability

Yuxi Sun, Xin Shen

College of Education, Zheji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angzhou Zhejiang

Received: April 23, 2026; accepted: May 29, 2026; published: June 9, 2026

##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popularization of internet technology, telecom and online fraud has evolved into a major social issue threatening public property safety and mental health in China. Due to the strong

concealment of fraud perpetrators, extant studies predominantly focus on individual vulnerability to online fraud victimization.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reviews previous literature in this field, defines core concepts including online fraud and victimization vulnerability, and expounds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such as the limited self-control theory, dual-system processing theory, and routine activity theory. It summarizes the psychological influencing factors of online fraud susceptibility from four dimensions: cognition, emotion, personality traits and social environment. In addition, this study concludes prevailing vulnerability measurement methods, as well as academic consensus and controversies in current research. On this basis, the limitations of existing studies are clarified, and future research prospects are proposed from multiple dimensions. This research intends to supplement and optimize the relevant theoretical system, and provide evidence-based psychological references for targeted anti-fraud intervention and prevention in China.

## Keywords

Online Fraud, Victimization Vulnerability, Self-Control, Anti-Fraud Prevention and Control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 1. 引言

欺诈是指个体故意歪曲事实,以“实际上不存在或从未打算提供的商品、服务或其他经济利益”为承诺,企图对他人进行误导的行为(Titus et al., 1995)。当前,欺诈已成为全球性的紧迫社会问题,随着互联网技术在我国快速发展与广泛普及,欺诈活动逐步通过电信与互联网媒介向非接触性模式转移,网络诈骗已成为危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主要犯罪类型(Fan & Yu, 2021)。在我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长期处于高位运行状态,成为财产犯罪的主要表现形式(Zhang & Ye, 2022),不仅给受害者造成直接的财产损失,更带来严重的身体损害(Button et al., 2014)与长期的心理创伤(Cross, 2015; Ganzini et al., 1990),严重削弱社会公众的安全感与满意度。

由于欺诈行为本身具有极强的隐蔽性,研究者难以直接发现或接触诈骗实施者,目前已知的诈骗者相关信息多来源于传闻或受害者的回忆描述,导致直接开展针对诈骗实施者的研究存在较大难度。因此,现有关于欺诈的研究多聚焦于欺诈脆弱性这一核心维度。脆弱性(vulnerability)是指组织或个体无法有效应对潜在风险的状态,在犯罪学领域,其被定义为:若个体因自身所处的情境或客观形势,无法有效照顾、保护自身或他人免受伤害与剥削,则该个体具有脆弱性(College of Policing, 2019)。从心理学视角来看,“网络诈骗脆弱性”特指个体遭受网络诈骗的易感程度,是个体心理特征与诈骗情境相互作用下的综合体现(Gao, 2021)。目前,学界衡量欺诈易感性的主要方法包括三类:受骗经历报告法、量表测试法与易感性测试法(Lyu et al., 2025)。

以往研究中,研究者从多学科视角对网络诈骗脆弱性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探讨。在内在因素层面,年龄偏低、教育水平较低、冲动性较强、信任倾向较高的个体,其网络诈骗受害风险更高;在外在因素层面,经历负面生活事件、社会支持薄弱的群体,更易成为网络诈骗的目标(Zhang & Ye, 2022)。Xu et al. (2024)进一步研究指出,认知成熟度、易受说服力、风险感知与获益预期等心理因素,在预测个体诈骗易感性方面,可能比年龄、教育水平等人口学变量具有更强的解释力,凸显了心理因素在网络诈骗脆弱性研究中的核心价值。

尽管当前关于网络诈骗脆弱性的相关研究不断积累,研究成果日益丰富,但针对网络诈骗受害脆弱

性的心理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 尚未形成系统性的梳理与整合, 现有研究存在碎片化问题, 未能清晰呈现各心理因素间的内在关联与作用路径。基于此, 本文对该领域的现有研究进行全面系统的综述, 明确网络诈骗受害脆弱性的核心概念与相关理论框架, 整合影响个体网络诈骗脆弱性的关键心理因素, 系统评述当前研究存在的不足, 并提出未来的研究方向, 以期为后续相关研究的开展提供理论参考, 同时为反诈实践的精准推进提供整合性的心理学视角。

## 2. 研究现状

### 2.1. 核心概念界定

#### 2.1.1. 网络诈骗

网络诈骗指的是利用网络平台与技术, 通过欺骗的手段获得钱财的行为(Whitty, 2015; Whitty, 2019)。Tade 和 Aliyu (2011)则将其定义为利用互联网向目标对象提供欺诈性的邀请或交易。网络诈骗常具备以网络为渠道、以欺诈为策略、以侵害财产为目的等三大特征。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21)的数据, 网民最常遭遇的诈骗类型为虚假中奖、网络兼职、网购诈骗和冒充熟人诈骗; 而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2020)的研究则指出, 网络购物退款、刷单兼职、贷款手续费和虚假征信诈骗的受骗比例更高。总体来看, 当前我国网络诈骗以交易类、贷款类和冒充类为主要类型, 常见手法包括兼职手续费诈骗、冒充亲友诈骗和“杀猪盘”诈骗等。

#### 2.1.2. 受害脆弱性

英国警察学院(2019)将受害脆弱性定义为当一个人因自身状况或环境而无法照顾自己或他人、无法保护其免受伤害或剥削时, 其便处于弱势状态。在该定义中, 未明确说明伤害的类型或严重程度, 这使得脆弱状态在各类情形和情境中都存在解读空间。除此之外, 受害脆弱性还存在其他定义。Green (2007)对受害脆弱性的基本假设是, 越脆弱的人面临受害的风险越高, 且犯罪的影响和后果越大, 对受害者造成的伤害也越大。该定义下的脆弱性结合了风险水平和对受害者造成的伤害。

当前, 受害脆弱性已成为警方决策的关键因素, 探究其在欺诈领域下的应用具有重要意义。老年人的受害脆弱性通常被纳入消费者保护范畴, 以防范通过邮寄、电话或上门方式实施的诈骗(Age UK, 2015; Phillips, 2017)。同时, Hadlington 和 Chivers (2018)通过研究发现, 在网络诈骗情境下, 年轻人群体更容易成为受害者。欺诈行为为受害者带来重大的情感和经济冲击, 而这些受害者还可能成为反复被盯上的目标并再次遭受侵害(Whitty & Buchanan, 2015)。欺诈的高发生率和多样性意味着任何人都可能成为受害者(National Fraud Authority (NFA), 2011)。

Skidmore et al. (2020)在研究中归纳出受害脆弱性的三个维度:

(1) 易受攻击性, 即个体成为受害者的可能性, 侧重于个人或组织被欺诈的概率。欺诈问题的普遍存在以及其涵盖的作案手法种类繁多, 意味着广大民众都具有易受攻击性。因此, 这一维度对于特定个人提供服务的实用性较低, 其适用范围可能更多在于针对脆弱群体开展预防工作。

(2) 影响性, 即给受害者带来的经济、情感或身体伤害。对部分受害者而言, 损失规模以及情感与社会层面的影响可能十分重大。除了实际损失的严重性之外, 欺诈行为的影响还会受到受害者个人、社会和经济承受力的制约。

(3) 重复受害, 即受害者再次受害的可能性。对部分个体而言, 由于缺乏能力, 其会在一系列诈骗中持续受害; 或个体由于缺乏警惕性, 持续成为欺诈者的目标。

受害脆弱性的三个维度能够帮助构建不同的受害者类别, 每个维度很可能都代表着一个需求谱系, 受害脆弱性的严重程度或许能反映出受害者在各维度上的体验程度。

## 2.2. 主要理论基础

### 2.2.1. 有限自制力理论

有限自制力理论将自我控制定义为个体改变或抑制自身自动化反应的能力,包括个体的想法、情绪和行为等。该理论的基本假设如下:(1)自我控制是有限资源;(2)所有领域共用同一个自我控制资源,一个领域自我控制消耗的资源会影响另外一个领域的自我控制资源;(3)高自我控制的个体能够更好地完成抑制、改变或维持活动的行为,从而实现最终目的(Baumeister, Vohs, & Tice, 2007; Baumeister et al., 2000)。

在该理论的基础上, Schreck (1999)进一步发现,低自我控制的个体更容易遭受侵害。从因果机制的角度来看,低自我控制的个体倾向于追求即时满足,因而更频繁地参与高风险活动,这便增加了其受害的可能性。同时,他们往往缺乏主动规避风险的意识,这在一定程度上“配合”了欺诈者的行为,助长了诈骗的完成(Titus & Gover, 2001; see also Cullen et al., 1983; Levi, 1992; Walsh & Schram, 1980),这一发现为受害脆弱性的研究提供了支持。

### 2.2.2. 双系统加工理论

双系统加工理论认为存在热系统与冷系统两种认知处理类型。冷系统负责处理复杂的时空信息与情景记忆表征及思维活动,又称“认知系统”;热系统则基于个体无条件或条件性出发特征进行快速情绪处理反应,又称“情绪系统”。

诈骗行为的本质,正是诈骗者通过一系列操控手段打破受害者的冷热系统平衡,迫使受害者陷入热系统主导、冷系统功能抑制的认知与情绪状态,最终做出非理性的决策行为(Metcalf & Mischel, 1999; Williams et al., 2017)。同时,部分人群因慢性压力、情绪脆弱等导致冷系统调控力弱,或因认知不足、元认知能力欠缺不会主动启动冷系统策略,最终在热系统主导下做出非理性的转账、信息泄露等行为。这类群体往往拥有更强的受害脆弱性,更易成为诈骗的目标。

### 2.2.3. 日常活动理论与生活方式框架理论

在受害研究领域,日常活动理论(Cohen & Felson, 1979)与生活方式框架理论(Hindelang, Gottfredson, & Garofalo, 1978)是最具前景性的理论。这些理论相关的研究大多聚焦于特定人口统计变量如何在解释受害风险中发挥重要作用。现有证据表明,少数族裔、男性和单身人群面临的受害风险更高(Cohen, Kluegel, & Land, 1981);社会地位指标(如收入、教育程度和就业状况)也与受害情况存在关联。

在有关欺诈受害的研究中,人口统计变量反映欺诈目标选择和受害脆弱性的功能已得到证实,但关于这些变量的相对重要性,学界并未达成共识(Carach, Graycar, & Muscat, 2001)。

## 2.3. 网络诈骗受害脆弱性的核心心理影响因素

### 2.3.1. 认知因素

认知功能已被认为是影响个体在网络诈骗领域受害脆弱性的关键因素。大量研究表明,轻度认知功能的下降会导致个体草率决策、过度依赖启发式方法,并因记忆空白而更容易受到操纵(Ueno et al., 2021),从而更有可能提高个体的受害脆弱性。Judges 等人(2017)在研究中指出,在诈骗受害者群体整体的认知能力显著低于非受害者群体,包括但不限于语言、记忆、注意力等维度。

Koestner 等人(2016)在探究衰老对诈骗脆弱性的影响时发现,腹内侧前额叶皮层(vmPFC)的损伤可能会引起个体对诈骗性信息的敏感性。同时,也有研究者将 vmPFC 损伤患者与健康对照组相比,vmPFC 损伤患者更容易相信误导性广告,并表现出更强的广告产品购买意愿(Asp et al., 2012)。这些研究都证明,vmPFC——这一负责决策奖励、负面情绪调节以及社会与自我信息处理的重要区域,对个体受害脆弱性有着重要影响。

Kleitman 等人(2018)从流体智力和晶体智力两个维度对个体的受害脆弱性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智力测试得分较高,尤其是流体智力和语言理解能力得分较高的个体,受害脆弱性越低。该研究表明,更高的流体智力和语言推理能力能提升人们的注意力和认知管理能力,使其更高效地处理各类刺激,从而降低受害可能性。

综上所述,认知因素相关研究揭示了认知功能下降与受害脆弱性之间的内在关联,并从神经基础和智力维度两个层面初步阐明了其作用机制。然而,现有研究的主要局限在于难以推断认知功能与受害脆弱性之间的因果关系;研究样本多集中于认知功能衰退较为显著的老年群体,对认知功能正常或处于边缘水平的群体的研究尚不充分;且对认知因素与情绪、人格等变量交互作用机制的探讨较为有限。因此,整合神经心理学与认知心理学的理论与方法,开展大样本纵向追踪研究,厘清认知功能影响受害脆弱性的因果路径及边界条件,成为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 2.3.2. 情绪因素

恐惧、焦虑、恐慌等负面情绪是诈骗者最常利用的心理工具。诈骗者利用诈骗手段,在短时间内急剧提升受害者的情绪唤醒水平。在此状态下,个体的认知资源被压缩,信息加工从分析系统转向直觉系统,导致其更容易忽略诈骗信息中的风险线索(Norris et al., 2019)。Stalans 等人(2024)的研究发现,高焦虑个体被钓鱼邮件欺骗的可能性是低焦虑个体的四倍,表明焦虑水平与受害风险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联。

孤独感、情感缺失与高关系需求使个体更容易成为婚恋类、关怀类诈骗的目标。诈骗者通过长期情感互动建立虚假的亲密关系,利用受害者对爱与归属的未满足需求实施逐步剥削。Liao 等人(2024)的研究证实,孤独感能够显著预测中老年个体的诈骗受害风险,且这一关系在实验操纵下得到了因果层面的验证。Lamkin (2025)进一步发现,在女性样本中,孤独感的增加显著预测了其对于模拟约会信息的回应意愿,表明情感需求是驱动顺从行为的重要动机。

综上所述,情绪因素相关研究揭示了负面情绪唤醒与受害脆弱性之间的正向关联,并初步厘清了情绪信息窄化在诈骗过程中的核心作用机制。同时,也有研究关注到了情感缺失与特定诈骗类型的匹配性,为识别高风险人群提供了重要的实证依据。然而,现有研究的主要局限在于多采用横断面和实验室模拟设计,生态效度有限,难以完全还原真实诈骗情境中情绪的动态演化过程;对正性情绪(如过度兴奋、盲目乐观)在特定诈骗类型中的风险作用关注不足;且对情绪因素影响受害脆弱性的个体差异(如情绪调节能力的调节作用)探究不够深入。因此,在真实或高仿真诈骗情境中考察情绪的实时变化及其对决策的影响,明确情绪因素与其他心理变量的交互作用机制,成为未来研究的重要方向。

### 2.3.3. 人格与特质因素

目前,已有多项研究发现人格特质与受害脆弱性之间存在关联。Van de Weijer 和 Leukfeldt (2017)发现神经质得分更低的个体更有可能成为诈骗受害者;开放性得分更高的个体更容易成为网络辅助诈骗目标。而尽责性得分高的个体被认为有更低的受害脆弱性(Judges et al., 2017; van de Weijer & Leukfeldt, 2017)。此外, Xu 等人(2022)的研究发现高冲动性的个体会更容易陷入网络诈骗; Zhang 和 Ye (2022)发现低冲动性的个体可以更好地识别诈骗信息。Sarno and Black (2024)发现更高的冲动性和外向性、更低的开放性以及宜人性能提升个体的受骗易感性。而 Koning 等人(2024)的研究表明,自我控制能力低下是多种诈骗类型中遭遇诈骗及易受诈骗影响的最强预测因素。

不同类型的诈骗也对应着不同的人格风险因素: Whitty 等人(2018)指出,冲动性和自我控制能力低下是遭遇浪漫诈骗的预测因素,而 Jones 等人(2019)发现追求感官刺激的个体容易陷入钓鱼诈骗。

然而,并非所有研究都证实了人格特质与欺诈风险之间存在关联。Kirwan 等人(2018)发现,社交网络欺诈受害情况与大多数人格特质之间不存在显著关联。

综上所述,人格与特质因素相关研究揭示了不同人格特质对受害风险的差异化影响,并初步梳理出特质因素与诈骗类型的匹配性,丰富了网络诈骗受害脆弱性的心理机制研究框架,也为精准识别高风险人群提供了重要的实证支撑。然而,现有研究的主要局限在于结论存在不一致性,有部分研究未证实人格特质与诈骗受害风险的关联,且对特质因素影响受害脆弱性的内在作用路径关注度不够。因此,整合现有研究结论,厘清人格特质与网络诈骗受害脆弱性的因果关系及中间作用机制,明确特质因素影响受害风险的具体路径,开展更具针对性的本土化、精细化研究,推动研究成果向反诈实践转化,成为亟待解决的核心问题。

#### 2.3.4. 社会与环境因素

社会与环境因素在网络诈骗受害脆弱性中同样扮演着不可忽视的角色。这些因素通过塑造个体的信息环境、社会支持网络及风险暴露程度,间接或直接影响其受害风险。

社会支持指个体为应对压力从社交网络中获得的心理支持和物质资源(Cohen & Wills, 1985),是抵御网络诈骗受害的重要保护性因素。研究发现,独居或与外界联系较少的个体,因缺乏及时的提醒与干预,在面对诈骗时更容易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Norris 等人(2019)的系统综述指出,社会隔离是诈骗受害的重要预测因素之一,老年群体因丧偶、子女离家等原因导致的社会网络萎缩,进一步加剧了其受害脆弱性。相反,拥有紧密家庭关系或社区联结的个体,在接到可疑电话或信息时更倾向于向他人求证,从而有效阻断诈骗的完成。

负面生活事件(如离异、丧亲、失业、重大疾病等)会通过两条路径影响个体的受害脆弱性。其一,这些事件直接引发个体的负性情绪状态(如抑郁、焦虑),削弱其认知资源和判断能力;其二,长期的压力积累会降低个体的心理韧性,使其在面对诈骗时更难调动理性的应对策略。Whitty 和 Buchanan (2015)在对婚恋诈骗受害者的访谈中发现,相当比例的受害者在被骗前经历了重大生活变故(如丧偶、离婚),其情感需求的激增恰与诈骗者的目标选择形成“契合”。Liao 等人(2024)的研究进一步证实,累积的生活压力与诈骗受害风险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反诈教育的普及程度与个体的受害脆弱性呈负相关。接受过系统反诈训练的个体,不仅能够更准确地识别常见诈骗手法,还具备更完善的应对策略(如挂断电话、官方渠道核实、求助他人)。然而,当前反诈教育在不同群体间的覆盖仍不均衡。老年群体、低教育水平群体及农村地区居民往往缺乏针对性的反诈知识普及,使其在面对新型诈骗手法时更为被动。Kircanski 等人(2018)的研究发现,仅向老年人提供诈骗警示信息的效果有限,结合案例教学、行为演练的干预方式更能有效提升其识别能力。这表明,反诈教育的内容与形式同样影响其保护效果。

综上所述,社会与环境因素相关研究揭示了不同社会环境因素对网络诈骗受害的保护或风险作用,同时也有研究关注到了重点人群的环境风险差异,为从社会层面构建反诈防护体系提供了重要的实证依据。然而,现有研究的主要局限在于大多聚焦于单一社会环境因素的独立作用,对不同社会因素间的交互效应探究不足;研究覆盖的群体和区域存在偏差,对农村、偏远地区群体的风险研究较为匮乏;且针对反诈教育的研究多停留在效果验证层面,对于干预方案的长效性和针对性优化关注不足。因此,深入探究不同社会与环境因素间的交互机制,扩大研究样本的覆盖面,重点关注各类弱势群体的认知特点和环境差异,构建长效化、精准化的反诈教育干预模式,推动反诈工作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预防”转型,成为亟待解决的核心问题。

#### 2.4. 受害脆弱性的测量方法

当前,网络诈骗受害脆弱性的测量方法主要分为主观自我报告和客观实验测量两类,共同构成了该领域的的方法学基础。

### 2.4.1. 主观自我报告

主观自我报告是测量受害脆弱性最常用、最便捷的方法,主要通过问卷、量表或访谈形式收集个体的自我评估信息。

受害经历回溯调查是最直接的测量方式,要求个体回顾并报告自身是否曾遭遇网络诈骗、受骗类型、经济损失程度及心理影响等。此类调查能够快速获取大样本的受害率数据。例如,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21)的全国性调查即采用此方法统计网民遭遇诈骗的类型分布。然而,该方法受限于个体的记忆准确性,且受害者可能因羞耻感或遗忘而漏报、瞒报。

欺诈脆弱性量表与易受说服性量表旨在测量个体对诈骗的一般脆弱性。其中,Modic 等人(2018)开发的易受说服性量表包含 10 个分量表,涵盖感觉寻求、风险偏好、社会影响等维度,具有良好的效度。此外,自我控制量表(如 Grasmick et al. (1993)开发的自控力量表)、冲动性量表(如 Dickman (1990)开发的冲动性量表)及情绪调节量表也被广泛用于测量受害脆弱性。这类量表的优势在于能够标准化、量化地评估潜在心理特质,但其局限性在于易受社会期许效应和共同方法偏差的影响。

### 2.4.2. 客观实验测量

为弥补主观报告方法的不足,研究者发展了一系列客观实验测量范式,通过模拟真实诈骗情境来评估个体的实际行为反应。

钓鱼邮件/诈骗话术辨别任务是应用最广泛的实验范式之一。研究者向参与者发送模拟的钓鱼邮件或呈现诈骗话术文本,要求其判断信息的真伪或决定是否回应。Luo 等人(2013)及 Vishwanath (2016)采用此方法,向大学师生发送虚假账户验证邮件,记录其点击链接或回复信息的实际行为。该方法的优势在于能够捕捉真实行为而非自我报告,但其伦理争议在于参与者未经知情同意即被“欺骗”。

假设诈骗情境判断采用情景模拟方式,向参与者呈现虚构的诈骗场景(如收到中奖通知、冒充客服退款等),要求其在假设条件下做出决策(如是否点击链接、是否转账)。此方法易于实施且伦理风险较低。例如,Getz 等人(2024)开发的情境判断评估问卷(ASJ)即采用此范式,包含 17 个条目,呈现诈骗与合法两种情景,要求参与者评估采取某种行为的可能性。然而,该方法的生态效度有限,参与者清楚自己处于研究情境中,其行为未必能完全反映真实受骗时的心理状态。

模拟诈骗与顺从行为测量进一步提升了实验的真实性。研究者设置完整的模拟诈骗流程,观察参与者的顺从行为(如是否提供个人信息、是否完成转账操作)。此类设计能够更真实地还原诈骗互动过程,但操作复杂、伦理审查严格,且难以大规模实施。Reithmaier 等人(2025)开发的 PhishyMailbox 工具即尝试在生态效度与实验控制之间寻求平衡,通过模拟真实钓鱼攻击环境实现可重复的生态效度测量。

## 2.5. 共识与不一致

### 2.5.1. 主要共识

第一,低自我控制、高冲动性与高信任倾向能显著预测受害风险。大量研究一致表明,低自我控制个体因倾向于追求即时满足、缺乏风险规避意识,更容易落入诈骗陷阱(Schreck, 1999; Holtfreter et al., 2008; Koning et al., 2024)。冲动性同样被证实是多种诈骗类型的强预测因素(Xu et al., 2022; Sarno & Black, 2024)。此外,高信任倾向使个体在面对可疑信息时更少质疑、更易顺从,从而增加受害可能性(Judges et al., 2017)。

第二,情绪唤醒与认知窄化是受骗的关键近端机制。诈骗者通过制造时间压力、恐惧或焦虑情绪,在短时间内急剧提升受害者的情绪唤醒水平,导致其认知资源被压缩、注意力窄化,仅关注诈骗者提供的单一信息框架而丧失批判性思考能力(Lacey et al., 2024; Wang et al., 2012)。这一机制得到双系统加工理论和情绪唤醒研究的广泛支持。

第三, 社会支持与反诈训练可降低脆弱性。充足的社会支持能够为个体提供即时的信息验证渠道和决策参考, 有效阻断诈骗的完成(Norris et al., 2019)。反诈教育同样被证实能够提升个体的诈骗识别能力和应对策略, 从而降低受害风险。

### 2.5.2. 主要不一致

第一, 部分研究未发现自我控制对特定诈骗类型的预测作用。尽管自我控制被普遍视为核心预测变量, 但部分研究中并未发现其显著效应。这可能与不同诈骗类型对认知资源的需求差异有关: 高度复杂的诈骗可能需要更长时间的情绪卷入和关系建立, 自我控制的作用机制在其中可能被其他变量中介或调节。

第二, 年龄、教育等人口变量的调节效应结论不统一。传统观点认为老年人更易受骗, 但 Ross 等人 (2014) 指出, 这一结论可能源于方法论偏差, 老年人虽更易被接触, 但未必有更高的受害率。Hadlington 和 Chivers (2018) 甚至发现年轻群体在某些诈骗类型中受害风险更高。教育程度的保护效应同样存在争议, 部分研究发现高教育水平个体因更高的网络使用频率反而面临更高暴露风险。

第三, 当前研究多聚焦于相对稳定的特质因素, 而对情绪唤醒、自我损耗、时间压力、社会隔离等状态因素的动态影响探讨不足。这些状态因素恰恰是诈骗者在具体情境中能够实时操纵的变量, 其作用机制有待进一步探究。

### 2.5.3. 小结

上述共识与不一致表明, 网络诈骗受害脆弱性是一个多因素交互作用的复杂构念。未来研究需要在统一理论框架下, 进一步厘清不同变量之间的边界条件与中介调节机制, 以推动该领域理论的整合与发展。

## 3. 研究展望

基于前述对核心概念、理论基础、影响因素及测量方法的系统梳理, 结合当前实证研究的共识与争议, 本综述提出以下七个方面的研究展望, 为未来网络诈骗受害脆弱性研究提供方向指引。

### 3.1. 统一概念体系与测量工具

当前研究对受害脆弱性的概念界定仍存在较大分歧, 不同学者从易受攻击性、影响性、重复受害等不同维度加以定义(Skidmore et al., 2020), 导致研究结果难以直接比较。未来研究应明确区分特质脆弱性(个体相对稳定的易感倾向, 如低自我控制、高冲动性)与状态脆弱性(个体在特定情境下的临时易感状态, 如情绪唤醒、自我损耗), 并在此基础上开发信效度高、适用于中国人群的标准化受害脆弱性量表。统一的概念体系和测量工具是提升研究可比性、推动理论整合的前提。

### 3.2. 加强状态脆弱性与动态过程研究

现有研究过度聚焦于静态的人格特质和人口变量, 而对诈骗发生过程中实时变化的心理状态关注不足。诈骗者的核心策略恰恰在于通过特定话术和情境设计, 在短时间内激活并放大个体的状态脆弱性。未来研究应从静态特质转向动态心理过程, 采用经验取样法(ESM)、生态瞬时评估(EMA)等密集追踪方法, 关注情绪唤醒、自我损耗、时间压力、社会隔离等状态因素如何实时提升受骗风险, 揭示脆弱性的临界条件与转化机制。

### 3.3. 推进本土化与文化情境研究

当前研究主要基于西方样本和诈骗类型, 其结论能否推广至中国语境尚待验证。中国网络诈骗具有鲜明的本土特征, 注销贷款、冒充客服、刷单返利等诈骗类型高发, 与西方常见的钓鱼邮件、婚恋诈骗

存在差异。未来研究应针对这些高发类型开展本土化实证研究,探索关系导向、面子观念等中国文化因素在网络诈骗受害过程中的作用机制。例如,冒充公检法诈骗的高发是否与民众对权威的服从倾向有关?刷单返利诈骗的蔓延是否与“熟人推荐”“群内托儿”等关系运作方式相关?这些问题的回答将有助于构建更具文化敏感性的理论模型。

### 3.4. 深化神经与认知机制研究

尽管已有研究开始关注认知功能与受害脆弱性的关系(如 Ueno et al., 2021; Asp et al., 2012),但对其神经基础的探讨仍处于起步阶段。未来研究可结合事件相关电位(ERP)、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等技术,探索个体在面临诈骗信息时的风险感知、情绪调控、决策抑制等认知过程的神经基础。例如,腹内侧前额叶皮层(vmPFC)在奖励评估与情绪调节中的功能异常是否可预测受害脆弱性?时间压力下个体为何更易做出非理性决策,其神经机制是什么?这些问题的回答将为精准干预提供生物学依据。

### 3.5. 开展纵向与重复受害研究

当前研究以横断面设计为主,难以揭示受害脆弱性与受害经历之间的因果关系及动态演变过程。尤其值得关注的是重复受害现象——部分受害者在一次被骗后,会因自责、羞耻或缺乏应对能力而再次成为诈骗目标(Whitty & Buchanan, 2015)。未来研究应开展纵向追踪调查,观察个体受骗前后心理特征(如自我控制、情绪状态、应对方式)的变化轨迹,探索重复受害的心理机制,建立涵盖脆弱性、受害经历与恢复过程的长期风险模型。此类研究对于识别高风险群体、设计分阶段干预方案具有重要意义。

### 3.6. 发展实证有效的心理干预策略

理论研究的最终目标是服务于反诈实践。未来研究应基于已识别的心理机制,开发低成本、易推广的简短干预方案(Brief Intervention)。可探索的方向包括:情绪暂停训练(帮助个体在情绪唤醒状态下主动暂停决策)、批判性提问技巧(训练个体在面对可疑信息时自动启动质疑性思维)、拒绝话术训练(通过行为演练提升个体拒绝诈骗请求的能力),以及社会支持嵌入方案(设计家庭/社区层面的互助验证机制)。这些干预策略应在不同人群(如老年人、大学生、农村居民)中开展随机对照试验,验证其有效性并优化实施方案。

### 3.7. 多学科交叉与技术融合

网络诈骗受害脆弱性是一个跨越心理学、犯罪学、计算机科学、传播学等多学科领域的复杂问题。未来研究应打破学科壁垒,推动理论与方法的交叉融合。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人工智能(AI)技术在反诈领域的应用潜力:基于个体的心理特征、网络行为模式和社会关系网络,可构建机器学习模型实现对高风险人群的早期识别与动态预警;结合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可实时分析诈骗话术中的心理操控策略,辅助反诈宣传的精准推送。最终目标是构建“识别-干预-阻断”全链条反诈体系,实现从被动应对到主动防御的范式转变。

## 4. 结论

网络诈骗受害脆弱性是一个多因素、多机制交互作用的复杂概念,其研究兼具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本文的系统梳理,不仅厘清了该领域的研究脉络、共识与争议、主要不足,构建了更具逻辑性的理论框架,也为后续开展本土化、精细化研究提供了明确指引。未来,随着研究方法的创新与多学科的深度融合,相关研究将进一步揭示网络诈骗受害的心理作用机制,为精准识别高风险人群、构建“识别-干预-阻断”全链条反诈体系提供更具针对性的心理学支撑,助力提升我国反诈防控工作的科学性与实效性。

## 基金项目

2025 年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创业训练项目浙江省级一般项目推荐项目(S202510337133X)研究成果。

## 参考文献

-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21). 第4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https://www2.cnnic.cn/NMediaFile/old\\_attach/P020210203334633480104.pdf](https://www2.cnnic.cn/NMediaFile/old_attach/P020210203334633480104.pdf)
-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2020). 新形势下电信网络诈骗治理研究报告(2020年). <http://www.caict.ac.cn/kxyj/qwfb/ztbg/202012/P020201218393889946295.pdf>
- Age, U. K. (2015). *Only the Tip of the Iceberg: Fraud against Older People Evidence Review*. Age UK.
- Asp, E., Manzel, K., Koestner, B., Cole, C. A., Denburg, N. L., & Tranel, D. (2012). A Neuropsychological Test of Belief and Doubt: Damage to Ventromedial Prefrontal Cortex Increases Credulity for Misleading Advertising. *Frontiers in Neuroscience*, 6, Article ID: 21828. <https://doi.org/10.3389/fnins.2012.00100>
- Baumeister, R. F., Muraven, M., & Tice, D. M. (2000). Ego Depletion: A Resource Model of Volition, Self-Regulation, and Controlled Processing. *Social Cognition*, 18, 130-150. <https://doi.org/10.1521/soco.2000.18.2.130>
- Baumeister, R. F., Vohs, K. D., & Tice, D. M. (2007). The Strength Model of Self-Control.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16, 351-355. <https://doi.org/10.1111/j.1467-8721.2007.00534.x>
- Button, M., Lewis, C., & Tapley, J. (2014). Not a Victimless Crime: The Impact of Fraud on Individual Victims and Their Families. *Security Journal*, 27, 36-54. <https://doi.org/10.1057/sj.2012.11>
- Carach, C., Graycar, A., & Muscat, G. (2001). *The Victimization of Older Australians*. Australian Institute of Criminology.
- Cohen, L. E., & Felson, M. (1979). Social Change and Crime Rate Trends: A Routine Activity Approach.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4, 588-608. <https://doi.org/10.2307/2094589>
- Cohen, L. E., Kluegel, J. R., & Land, K. C. (1981). Social Inequality and Predatory Criminal Victimization: An Exposition and Test of a Formal Theor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6, 505-524. <https://doi.org/10.2307/2094935>
- Cohen, S., & Wills, T. A. (1985). Stress, Social Support, and the Buffering Hypothesi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98, 310-357. <https://doi.org/10.1037/0033-2909.98.2.310>
- College of Policing (2019). *Recognising and Responding to Vulnerability Related Risks: Scope of Practice Guidelines Version 2.1*. <https://link.wtturl.cn/?target=https%3A%2F%2Fwww.college.police.uk%2Fguidance%2Fvulnerability-related-risks&scene=im&aid=497858&lang=zh>
- Cross, C. (2015). No Laughing Matter: Blaming the Victim of Online Fraud.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Victimology*, 21, 187-204. <https://doi.org/10.1177/0269758015571471>
- Cullen, F. T., Clark, G. A., Mathers, R. A., & Cullen, J. B. (1983). Public Support for Punishing White-Collar Crime: Blaming the Victim Revisited? *Journal of Criminal Justice*, 11, 481-493. [https://doi.org/10.1016/0047-2352\(83\)90002-8](https://doi.org/10.1016/0047-2352(83)90002-8)
- Dickman, S. J. (1990). Functional and Dysfunctional Impulsivity: Personality and Cognitive Correlat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8, 95-102. <https://doi.org/10.1037/0022-3514.58.1.95>
- Fan, J. X., & Yu, Z. (2021). Prevalence and Risk Factors of Consumer Financial Fraud in China. *Journal of Family and Economic Issues*, 43, 384-396. <https://doi.org/10.1007/s10834-021-09793-1>
- Ganzini, L., McFarland, B. H., & Cutler, D. (1990). Prevalence of Mental Disorders after Catastrophic Financial Loss. *The Journal of Nervous and Mental Disease*, 178, 680-685. <https://doi.org/10.1097/00005053-199011000-00002>
- Gao, Y. (2021). *Influencing Factors of Susceptibility to Online Fraud Among College Students*. Master's Thesis, Zhejiang University.
- Getz, S. J., Levin, B. E., & Galvin, J. E. (2024). The Assessment of Situational Judgement Questionnaire: A Novel Instrument to Detect Susceptibility to Financial Scamming. *Journal of Alzheimer's Disease*, 97, 1365-1379. <https://doi.org/10.3233/jad-231194>
- Grasmick, H. G., Tittle, C. R., Bursik, R. J., & Arneklev, B. J. (1993). Testing the Core Empirical Implications of Gottfredson and Hirschi's General Theory of Crime. *Journal of Research in Crime and Delinquency*, 30, 5-29. <https://doi.org/10.1177/00224278930300001002>
- Green, S. (2007). Crime, Victimization and Vulnerability. In S. Walklate (Ed.), *Handbook of Victims and Victimology* (pp. 91-118). Willan.
- Hadlington, L., & Chivers, S. (2018). Segmentation Analysis of Susceptibility to Cybercrime: Exploring Individual Differences

- in Information Security Awareness and Personality Factors. *Policing: A Journal of Policy and Practice*, 14, 479-492. <https://doi.org/10.1093/police/pay027>
- Hindelang, M., Gottfredson, M. R., & Garofalo, J. (1978). *Victims of Personal Crime*. Ballinger.
- Holtfreter, K., Reising, M. D., & Pratt, T. C. (2008). Low Self-Control, Routine Activities, and Fraud Victimization. *Criminology*, 46, 189-220. <https://doi.org/10.1111/j.1745-9125.2008.00101.x>
- Jones, H. S., Towse, J. N., Race, N., & Harrison, T. (2019). Email Fraud: The Search for Psychological Predictors of Susceptibility. *PLOS ONE*, 14, e0209684.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209684>
- Judges, R. A., Gallant, S. N., Yang, L., & Lee, K. (2017). The Role of Cognition, Personality, and Trust in Fraud Victimization in Older Adults.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8, Article No. 588. <https://doi.org/10.3389/fpsyg.2017.00588>
- Kircanski, K., Notthoff, N., DeLiema, M., Samanez-Larkin, G. R., Shadel, D., Mottola, G. et al. (2018). Emotional Arousal May Increase Susceptibility to Fraud in Older and Younger Adults. *Psychology and Aging*, 33, 325-337. <https://doi.org/10.1037/pag0000228>
- Kirwan, G. H., Fullwood, C., & Rooney, B. (2018). Risk Factors for Social Networking Site Scam Victimization among Malaysian Students. *Cyberpsychology, Behavior, and Social Networking*, 21, 123-128. <https://doi.org/10.1089/cyber.2016.0714>
- Kleitman, S., Law, M. K. H., & Kay, J. (2018). It's the Deceiver and the Receiver: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Phishing Susceptibility and False Positives with Item Profiling. *PLOS ONE*, 13, e0205089.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205089>
- Koestner, B. P., Hedgcock, W., Halfmann, K., & Denburg, N. L. (2016). The Role of the Ventromedial Prefrontal Cortex in Purchase Intent among Older Adults. *Frontiers in Aging Neuroscience*, 8, Article No. 189. <https://doi.org/10.3389/fnagi.2016.00189>
- Koning, L., Junger, M., & Veldkamp, B. (2024). Risk Factors for Fraud Victimization: The Role of Socio-Demographics, Personality, Mental, General, and Cognitive Health, Activities, and Fraud Knowledge.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Victimology*, 30, 443-479. <https://doi.org/10.1177/02697580231215839>
- Lacey, D., Campbell, A., Goode, S., & Ridout, B. (2024). The Cyberpsychology of Deception: A Mini Review of the Psychological Factors Influencing Scam Compliance. *Annual Review of Cybertherapy and Telemedicine*, 22, 34-41.
- Lamkin, A. (2025). *Scammed Out of Love: Susceptibility to Online Romance Scams among Women*. Senior Thesis, Scripps College.
- Levi, M. (1992). White-Collar Crime Victimization. In K. Schlegel & D. Weisburd (Eds.), *White-Collar Crime Reconsidered* (pp. 169-192).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 Liao, S., Wang, X., & Zhang, X. (2024). Loneliness Could Lead to Risk of Fraud Victimization for Middle-Aged and Older Adults. *Journal of Elder Abuse & Neglect*, 36, 508-527. <https://doi.org/10.1080/08946566.2024.2404040>
- Luo, X. R., Zhang, W., Burd, S., & Seazzu, A. (2013). Investigating Phishing Victimization with the Heuristic-Systematic Model: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an Exploration. *Computers & Security*, 38, 28-38. <https://doi.org/10.1016/j.cose.2012.12.003>
- Lyu, C., Gao, S., & Zhang, Q. (2025). The Impact of Time Pressure and Type of Fraud on Susceptibility to Online Fraud.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16, Article ID: 1508363. <https://doi.org/10.3389/fpsyg.2025.1508363>
- Metcalf, J., & Mischel, W. (1999). A Hot/Cool-System Analysis of Delay of Gratification: Dynamics of Willpower. *Psychological Review*, 106, 3-19. <https://doi.org/10.1037/0033-295X.106.1.3>
- Modic, D., Anderson, R., & Palomäki, J. (2018). We Will Make You like Our Research: The Development of a Susceptibility-to-Persuasion Scale. *PLOS ONE*, 13, e0194119.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194119>
- National Fraud Authority (2011). *A Quantitative Segmentation of the UK Population: Helping to Determine How, Why and When Citizens Become Victims of Fraud*. National Fraud Authority.
- Norris, G., Brookes, A., & Dowell, D. (2019). The Psychology of Internet Fraud Victimization: A Systematic Review. *Journal of Police and Criminal Psychology*, 34, 231-245. <https://doi.org/10.1007/s11896-019-09334-5>
- Phillips, C. (2017). From "Rogue Traders" to Organized Crime Groups: Doorstep Fraud of Older Adults. *The British Journal of Criminology*, 57, 608-626. <https://doi.org/10.1093/bjc/azw011>
- Reithmaier, O. D., Thiel, T., Vonderheide, A., & Dürmuth, M. (2025). Vision: Retiring Scenarios—Enabling Ecologically Valid Measurement in Phishing Detection Research with PhishyMailbox. In *Proceedings of the 2025 Symposium on Usable Security (USEC)* (pp. 1-7). San Diego. <https://doi.org/10.14722/usec.2025.23037>
- Ross, M., Grossmann, I., & Schryer, E. (2014). Contrary to Psychological and Popular Opinion, There Is No Compelling Evidence That Older Adults Are Disproportionately Victimized by Consumer Fraud. *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9, 427-442.
- Sarno, D. M., & Black, J. (2024). Who Gets Caught in the Web of Lies? Understanding Susceptibility to Phishing Emails,

- Fake News Headlines, and Scam Text Messages. *Human Factors: The Journal of the Human Factors and Ergonomics Society*, 66, 1742-1753. <https://doi.org/10.1177/00187208231173263>
- Schreck, C. J. (1999). Criminal Victimization and Low Self-Control: An Extension and Test of a General Theory of Crime. *Justice Quarterly*, 16, 633-654. <https://doi.org/10.1080/07418829900094291>
- Skidmore, M., Goldstraw-White, J., & Gill, M. (2020). Vulnerability as a Driver of the Police Response to Fraud. *Journal of Criminological Research, Policy and Practice*, 6, 49-64. <https://doi.org/10.1108/jcrpp-11-2019-0068>
- Stalans, L., Chan-Tin, E., Hart, A., Moran, M., & Kennison, S. (2024). Open Access: Predicting Phishing Victimization: Comparing Prior Victimization, Cognitive, and Emotional Styles, and Vulnerable or Protective E-Mail Strategies. In S. Byrne, & J. Byrne (Eds.), *Scams, Cons, Frauds, and Deceptions* (pp. 32-51). Routledge. <https://doi.org/10.4324/9781003474982-3>
- Tade, O., & Aliyu, I. (2011). Social Organization of Internet Fraud among University Undergraduates in Nigeri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yber Criminology*, 5, 860-875.
- Titus, R. M., & Gover, A. R. (2001). Personal Fraud: The Victims and the Scams. In G. Farrell & K. Pease (Eds.), *Repeat Victimization* (pp. 133-152). Criminal Justice Press.
- Titus, R. M., Heinzlmann, F., & Boyle, J. M. (1995). Victimization of Persons by Fraud. *Crime & Delinquency*, 41, 54-72. <https://doi.org/10.1177/0011128795041001004>
- Ueno, D., Daiku, Y., Eguchi, Y., Iwata, M., Amano, S., Ayani, N. et al. (2021). Mild Cognitive Decline Is a Risk Factor for Scam Vulnerability in Older Adults. *Frontiers in Psychiatry*, 12, Article ID: 685451. <https://doi.org/10.3389/fpsy.2021.685451>
- van de Weijer, S. G. A., & Leukfeldt, E. R. (2017). Big Five Personality Traits of Cybercrime Victims. *Cyberpsychology, Behavior, and Social Networking*, 20, 407-412. <https://doi.org/10.1089/cyber.2017.0028>
- Vishwanath, A. (2016). Mobile Device Affordance: Explicating How Smartphones Influence the Outcome of Phishing Attacks.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63, 198-207. <https://doi.org/10.1016/j.chb.2016.05.035>
- Walsh, M. E., & Schram, D. D. (1980). The Victim of White-Collar Crime: Accuser or Accused? In G. Geis, & E. Stotland (Eds.), *White-Collar Crime: Theory and Research* (pp. 32-51). Sage Publications.
- Wang, J., Herath, T., Chen, R., Vishwanath, A., & Rao, H. R. (2012). Research Article Phishing Susceptibility: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Processing of a Targeted Spear Phishing Email. *IEEE Transactions on Professional Communication*, 55, 345-362. <https://doi.org/10.1109/TPC.2012.2208392>
- Whitty, M. T. (2015). Mass-Marketing Fraud: A Growing Concern. *IEEE Security & Privacy*, 13, 84-87. <https://doi.org/10.1109/msp.2015.85>
- Whitty, M. T. (2018). Do You Love Me? Psyc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Romance Scam Victims. *Cyberpsychology, Behavior, and Social Networking*, 21, 105-109. <https://doi.org/10.1089/cyber.2016.0729>
- Whitty, M. T. (2019). Predicting Susceptibility to Cyber-Fraud Victimhood. *Journal of Financial Crime*, 26, 277-292. <https://doi.org/10.1108/jfc-10-2017-0095>
- Whitty, M. T., & Buchanan, T. (2015). The Online Dating Romance Scam: The Psychological Impact on Victims—Both Financial and Non-Financial. *Criminology & Criminal Justice*, 16, 176-194. <https://doi.org/10.1177/1748895815603773>
- Williams, E. J., Beardmore, A., & Joinson, A. N. (2017).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Susceptibility to Online Influence: A Theoretical Review.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72, 412-421. <https://doi.org/10.1016/j.chb.2017.03.002>
- Xu, L., Wang, J., Xu, D., & Xu, L. (2022). Integrating Individual Factors to Construct Recognition Models of Consumer Fraud Victimiz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19, Article No. 461. <https://doi.org/10.3390/ijerph19010461>
- Xu, L., Wen, X., Wang, J., Li, S., Shi, J., & Qian, X. (2024). Psychological Predictors of Online Fraud Victimhood in China: A Machine Learning Approach. *Psychology, Crime & Law*, 32, 703-726. <https://doi.org/10.1080/1068316x.2024.2389187>
- Zhang, Z., & Ye, Z. (2022). The Role of Social-Psychological Factors of Victimhood on Victimization of Online Fraud in China.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13, Article ID: 1030670. <https://doi.org/10.3389/fpsyg.2022.1030670>